

桑榆晚情

□齐照生

# 火车上， 我认识了一对外国朋友

6月18日，我从西安探望完姑姑返回洛阳时，在火车上结识了一对外国朋友，女的叫布诺尼，男的叫伽瑞。66岁的我不会说英语，他们也不会说汉语，但我们相处得十分愉快。

## 相识，从两张湿巾开始

我们乘坐的列车是双层空调车，这对外国朋友就坐在我的对面，一见面，我们互相打了招呼，都说“hello”。等放好行李坐下后，我们几个人都不再说话。

我观察了一下，对面这对夫妻都上了年纪，可能比较怕热，男的一直在流汗。我灵机一动，从包里取出一袋湿巾，抽出两张分别递给他们。他们笑了笑收下，说“thank you”，我也回了声“thank you”。之后，他们又叽里哇拉地说了一通，我什么也听不懂，只好摆手连说“不懂不懂”。旁边一个年轻人看到后，热情地过来给我们当翻译。他告诉我：“老外说谢谢你，在他们需要的时候，你帮助他们。”我问他们是哪国人，年轻人问了后告诉我，他们是德国人，后来移民到澳大利亚，现在是来中国自助游的。

后来，我慢慢弄明白，他们来中国自助游的第一站是到西安看兵马俑，第二站到洛阳看龙门，要呆两天，然后到郑州看少林寺，再到山东曲阜看孔庙，接着到青岛喝啤酒看世界杯转播，最后到北京游长城和故宫。老外通过那个年轻人问我：“1964年你在干什么？”我答“在学习”。他又问：“是上大学吗？”我说：“不，是中学生的，我的学历很低。”他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：“在余下的5个小时里，你说英语，我说汉语！”听翻译这么说，我很尴尬，因为我没有学过英语，怎么办呢？

## 汉语，从学“谢谢”说起

那个年轻人是西安一所大学的教师，外语讲得很好，通过他，我知道了两位老外的名字，并建议他们去上海看世博会，他们说有固定的路线，就不去了。之后，年轻人和我聊了一会儿世博会，就下车了。

我和这对外国朋友又陷入了沉默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飞虫落在了他们的窗边，布诺尼很惊慌，我镇定地伸出手将飞虫消灭，一场虚惊过去了。布诺尼从包里翻出一本像旅游指南一样的打印材料，翻到短语翻译处，指着thank you的中文翻译“谢谢”，示意我读出来，我读了一遍，他们一块儿跟着学，并用他们的方法



图文苑

注了音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就不断地使用“谢谢”二字。

看我在和外国朋友打交道，坐在右边的一对老夫妻也参与进来。他们是去西安参加亲友婚礼的，这会儿就把花生、糖果、瓜子之类的零食拿给我们吃。布诺尼点头说着“谢谢”，就开始剥花生吃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又拿起了瓜子，不过表情很奇怪：皱着眉头，瞪大眼睛，左右晃头。我猜她不会吃瓜子，就拿起一粒瓜子作示范，她也跟着学，但她用牙咬的是瓜子的正中间，瓜子被嗑碎了，剥起来很困难。我又示范了几次，她终于学会了，非常开心。伽瑞拿起相机，把我们交流的情景拍了下来，还大声说着“谢谢”。

## 回家，不料乐极生悲

到了11时30分，我从手提袋里拿出姑姑为我准备的午餐，是3个烧饼夹

肉。我示意布诺尼吃一个，她看了看，很好奇，就拿了一个像我一样吃起来，并点点头表示好吃。伽瑞也过来了，我把另一个烧饼给他，他吃得很香。我指着烧饼说“sister of father”，表示这烧饼是姑姑做的，这次他们听明白了，很高兴。通过手书，他们记住了我的名字，我也知道了布诺尼今年60岁，伽瑞今年62岁。最后，我们还交换了邮箱地址。一路上我们这么亲热，让其他乘客格外眼红。

到洛阳后，我们要分别了，伽瑞说我是他的第一个中国朋友。我想自己都已66岁了，也是第一次交外国朋友，真是乐事一桩。回到家，我还在想着火车上的事情，不留神把手机泡到了洗衣盆中，10分钟后才反应过来。手机被捞出来后，已经不能再用了，里面存的好多电话号码也找不到了，真是乐极生悲呀……

沧海一粟

□刘国珍

# 『永久』自行车的故事

1969年，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，乡革委会的秦主任邀请我到她蹲点的示范村搞合作医疗。

我所在的大队医疗室名气很大，平时病人很多，我也常常需要到附近村庄出诊。但是，背着急救包步行速度太慢，有时候难免会耽误病人的治疗，我急需一辆自行车代步。我到县城的商店里看过，那里只有永久、飞鸽、红旗这几个牌子的自行车，数量很少，而且凭票供应，极其难买。

大队医疗室有个女司药，她的爱人姓黄，是个军官，在上海服役，能买到很多紧俏商品。很多人都托小黄从上海买收音机、自行车等，我也去找了他，表达了自己想买一辆自行车的愿望。

过了两个月，我得到消息：自行车已经买到了，是永久牌的，并且已经托人在上海火车站办了托运手续，辗转千里运到了平顶山市区，提货单已经邮寄给我。收到提货单后，我马上从乡下步行20多公里，从早上走到中午，在提货的最后期限之前赶到市区，在平顶山火车站提出了一辆崭新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，看着别提多帅气了。我激动不已，骑上自行车一路疾驰，风从身边掠过，飘飘然如登仙境，200公里的归程，我只用了一个多小时。

一进村，聚在村口聊天的老乡们就围了上来，大家一边抚摸着我的新自行车，一边啧啧称赞，羡慕不已。我自豪地扶着车把，微笑不语，享受着众人瞩目的感觉。

这辆自行车的价格是150元，当时，我的月工资才32元，它足足花掉了我将近半年的工资。

过了几天，我和村里的电工骑着这辆自行车到邻县办事，路过自由市场，电工想去市场上看看，买点东西。我们推着自行车一进市场就吸引了众人的眼球，不少人围过来议论纷纷：“新永久，真漂亮！”“看，还是加重的！”……我们听着，心里无比自豪。正在这时，从北面市场管理办公室走来一位工作人员，他命令我们：“走，到办公室登个记，卖车需缴交易税。”电工支支吾吾不敢说话，“危急时刻”我挺身而出。那天我身穿新做的黑色军大衣，头戴新买的东北皮帽，脚蹬擦得亮晶晶的旧皮鞋，还戴着一个大口罩，很有派头，像个干部。我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同志，这辆车是前几天刚从上海运回来的，咋会卖呢？！”市场工作人员这才放下板着的脸，笑说：“误会了，对不起！”我和电工迅速“逃出”自由市场，骑上自行车飞也似的跑了。

20世纪60年代，农村人结婚要求三转一响——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和收音机。我和爱人结婚8年后，才买到一转（自行车）和一响（收音机），家里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，什么家具也没有。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，我和爱人相濡以沫，仍然生活得很快乐。后来我换了工作地点，这辆永久牌自行车被熟人高价买下，继续为当地老百姓服务。

闲话茶馆

□吴小毛

# 老人需要 自由空间

读过一篇《母亲不听话》的文章后，我深有感触。作者的母亲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，一生操劳，到晚年该享清福了，可就是不肯放下手中的事，还一如既往地忙碌着。儿子不想让母亲这么辛苦，就每月按时给家里寄钱。然而，母亲虽然表面接受了儿子的劝告，背地里仍然我行我素。

最初，我并不理解文章中这位母亲的做法，但通过对父亲自己的观察，我渐渐明白了。我的父亲不会抽烟，不会跳舞，不会搓麻将，偶尔喜欢喝两杯红酒，喜欢读书、看报、写稿子。他每个月的退休金约1400元，每年光买书报就要花掉1000元左右，而写稿得来的稿酬，一年也只有1000元左右。在吃穿方面，父亲非常节俭，我问他为什么不能对自己好点，父亲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孩子，你不懂……”

随着年龄增长，我渐渐明白：其实对老年人不必强求，萝卜白菜，各有所爱，只要他们高兴就好。退休之后，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、爱好去安排生活，每天都有喜欢的事情可做。否则，即使自己再有钱，儿女再孝顺，又有什么乐趣可言呢？

作为晚辈，如果你有一片孝心，真心实意地爱自己的父母，那就不妨设身处地地替他们想一想，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去安享自己的晚年，给他们一个自由自在的空间比什么都重要。

影像岁月

# 油田会战四姐妹

□姚淑云



这张发黄的照片是1958年夏初母亲在新疆乌鲁木齐齐照的，是她与3个同事姐妹的合影。照片最下方是母亲，母亲后面左侧是刘英，右侧是顾爱玲，后面短发的叫吴桂芳。那年母亲才20岁，其他3个姐妹也都在20岁上下。母亲是1956年结的婚，婚后第二年便随当兵的父亲（那时父亲已是副营级军官）转业到新疆，参加克拉玛依油田大会战。母亲说，当时来克拉玛依油田的除了转业军人及家属外，还有各类大中专

院校毕业分配的学生、内地支援油田建设的职工和家属等。这4姐妹中，刘英和吴桂芳都是大学生，顾爱玲则是从内地来的职工家属。

刚来时，她们住在同一个大帐篷里，彼此照应，相处十分和睦。能为新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大油田奉献青春，她们感到十分光荣。

1958年5月，国务院批准设立克拉玛依市，此时这里已有近2万名石油职工，矿区人口超过3万人。而新职工宿舍这时也已建成，即将乔迁新居，为了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，母亲和她朝夕相处的3个姐妹照了这张有纪念意义的合影。

岁月匆匆，如今母亲和她的3个姐妹早已退休，彼此也失去了联系，但母亲一直思念着她们。她常常拿出这张合影，向我们讲述当年石油大会战的情景，诉说她们4姐妹的工友情。

副刊

投稿:gyz0111@yahoo.com.cn

电话:65233688